

唐代環南海開發與
地域社會變遷研究

下
冊

王承文 著

中華書局

唐代環南海開發與
地域社會變遷研究

下冊

王承文 著

中華書局

第四章

唐代北方家族與嶺南開發 和社會變遷論考(上)

六朝隋唐時代,“溪洞”一詞頻繁地出現於史乘,其地域分布幾乎遍及長江以南極其廣大的中國南方,而嶺南則是“溪洞”記載最集中和最有代表性的地區之一。所謂“溪洞”又稱“山洞”、“村洞”、“洞”、“獠洞”、“俚洞”、“蠻洞”、“徭洞”等等。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一文,對東晉南朝南方溪洞部族源流及其社會狀況有過重要論述^①。徐中舒則指出“洞”乃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村公社,是一種“原始形態的村社共同體”,“它就是以一夫一妻制父系家庭,在土地公有的基礎上合耦共耕,共同分配生產物的耕作制的社會團體”,而且從商代一直延續到明清^②。河原正博《漢民族華南發展

①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9—106頁。

② 徐中舒《論商於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後的洞——對中國古代村社共同體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學學報》1978年第1期,第59頁。收入氏著《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264—1289頁。

史研究》討論了秦至宋元嶺南南越、俚獠等部族的社會形態及其與中央王朝的關係^①。川本芳郎《六朝時期蠻族考》一文指出六朝江南地區“溪洞”一詞具有濃厚的南方蠻族村落性質，然而“由於蠻漢接觸的加深”，“溪洞又呈現漢化的趨勢”^②。岑仲勉曾依據在廣州發現的晚唐《王渙墓志》，指出唐末有不少北方官員士人流落嶺南^③。近年來，凍國棟的《唐代人口問題研究》一書，則揭示了唐代各種移民活動的背景和方式，並給我們以重要啓發^④。衆所周知，唐代“安史之亂”後北方人口大量向南方遷移，是促使南方開發和中國南北經濟重心發生轉變的根本原因。然而，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一般多限定在江南地區，而唐代嶺南地區則由於歷史資料匱乏且極為分散，學術界相關討論還非常缺乏。唐朝也是嶺南經濟社會發生重要變化的時期。我們認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北方家族大量向嶺南移民。因此，我們將在對歷史資料作盡可能廣泛蒐集的基礎上，分多個專題從各方面探討唐代北方家族向嶺南移民的具體背景、主要方式及其對嶺南社會的重要影響。

第一節 唐代北方家族與嶺南地域文化意象嬗變論略

——以唐代張九齡和粵北始興張氏家族為例

“文化意象”是一種特定的文化符號，是人們對某一地域文化特色

① [日]河原正博《漢民族華南發展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年。

② [日]川本芳郎《六朝時期蠻族考》，《史學雜誌》1986年第8期。

③ 岑仲勉《從王渙墓志解決了晚唐史一兩個問題》，《歷史研究》1957年第9期，第57頁；收入岑仲勉著《金石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41—452頁。

④ 凍國棟《唐代人口問題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

所產生的直覺聯想。文化意象主要根源於各地區人們的生存環境和文化傳統,並有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早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著名漢學家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相繼撰有多種研究中古嶺南區域史的論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其《赤雀——唐代的南方意象》,該書從多方面論述了唐代嶺南地域文化意象的形成^①。張九齡(678—740)是盛唐時期嶺南籍的著名宰相和詩人。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中外學術界對於張九齡的仕宦經歷、政治作為和文學成就等,都已有專門而深入的研究^②。張九齡通過科舉進士考試走上仕途,並進入唐朝中央權力的核心。而粵北始興張氏作為一個出自邊遠蠻荒之地而且地位比較低微的家族,也因此崛起成為唐代嶺南最為顯赫的名門望族,而且一直延續至唐後期。這一歷史現象既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唐代嶺南區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是“中古社會革命”^③在嶺南地區的反映,同時也對唐以後嶺南地域文化意象的嬗變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我們有必要將這一問題置於更加長遠的歷史背景中,進行更加專門的考察和研究。

一 唐代嶺南粵北始興張氏家族的淵源和崛起

南宋時期著名粵籍學者李昉英(1201—1257)所撰《重修〈南海

① Edward H. Schafer,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② 何格恩《張九齡的政治生活》,《嶺南學報》1935年第三卷第四期;《張曲江著述考》,《嶺南學報》1935年第六期;《張九齡年譜》,《嶺南學報》1935年第三卷第四期。關於張九齡的政治事迹,還可參見P·A·Herbert, *Under the Brilliant Emperor Imperial Authority in Tang China as Seen in the Writings of Chang Chiu-ling*, Oriental Monograph Series No. 21, Faculty of Asia Studies in Association with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 1978.

③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2—103頁。

志》序》指出：

唐賢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張（九齡），曰日南之姜（公輔），最後得劉瞻於湟。是時閩聚猶未有此。然皆奇拔于支郡筦府，以廣名甚大，山偉海鉅，秀靈鳩凝。^①

李昂英從地域傑出人物的視角，揭示了唐代嶺南文化發展較之福建閩越地區所具有的先進性。張九齡，粵北韶州人（今廣東韶關），是唐玄宗開元年間的著名宰相；姜公輔，唐嶺南道安南都護府所屬愛州（今越南清化省）人，唐德宗時期宰相；劉瞻，粵北連州（今廣東連縣）人，唐懿宗時期宰相。以上三位宰相均是通過科舉進士考試進入政壇的。唐代閩越地區的科舉進士登第，唐代著名文學家政治家韓愈認為開始於晉江歐陽詹^②。歐陽詹與韓愈為貞元八年（792）同榜進士，不過其官職僅至唐國子監四門助教。

李昂英《重修〈南海志〉序》所稱道的三位嶺南籍宰相，其籍貫在

①（宋）李昂英撰，楊芷華點校《文溪存稿》卷三，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3頁。

②（唐）韓愈《歐陽生哀辭》稱“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韓昌黎集》卷二二；《新唐書》卷二〇三《歐陽詹傳》）。宋代孔平仲《珣璣新論》卷三亦稱：“福建人好文學，自唐常袞為觀察使，歐陽詹為諸生始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3冊，第121頁）然而，宋代吳曾撰《能改齋漫錄》卷四“閩人登第不自林藻始”條稱：“唐人以閩人第進士自歐陽詹始。予嘗以《唐登科記》考之，貞元七年林藻登第，貞元八年詹始登第，二人皆閩人。”吳曾又引王定保《唐摭言》考定，“神龍二年（706）閩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為東宮侍讀”，後因仕途困頓，“謝病東歸”。因此，吳曾稱：“案神龍二年乃唐中宗時，然則閩人第進士不惟不始於詹，亦不始於藻，當以薛令之為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89頁）。有關唐代福建科舉考試的研究，參見凍國棟《唐代閩中進士登場與文化發展管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十一期，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陳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88—106頁。

唐代均屬於交通要衝，而其家世均可以追溯至唐代南遷的北方家族^①。至於其所謂“奇拔于支郡筦府”，則反映了唐代嶺南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在地理空間格局上的重要變化，即並不局限於作為嶺南政治經濟核心的廣州及其附近地區，而是逐步向更大範圍擴展。

唐代徐浩所撰《張九齡神道碑》，將張九齡與唐玄宗時期的著名宰相姚崇、宋璟、張說一起，都看成是“開元盛世”的重要締造者^②。白居易稱張九齡“以儒學詩賦獨步一時。及輔弼明皇帝，號為賢相”^③。張九齡實際上也是歷史上嶺南籍人士第一次直接參與中央王朝中樞事務。在秦漢至隋唐歷史中，其政治地位是空前的。明代大學士著名粵籍學者海南人丘浚就提出，張九齡不僅是“嶺南第一流人物”，也是“江南第一流人物”，而且還是“唐一代第一流人物”^④。並高度評價其文章和功業對後世嶺南地域文化發展的深遠影響。值得指出的是，唐朝粵北始興張氏不但產生了像張九齡這樣傑出的人物，而且其眾多家族成員也出任唐朝中央和地方，使粵北始興張氏成為唐代嶺南當之無愧的名門望族。

(一) 關於唐朝粵北始興張氏的家族淵源

《新唐書·張九齡傳》稱張九齡為“韶州曲江人”^⑤。《舊唐書·張

① 參見王承文《唐代北方家族與嶺南溪洞社會》，《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② 《全唐文》卷四四〇，第4489頁。

③ (唐)白居易《唐故秘書監張仲方墓志銘》，《白氏長慶集》卷六一；《文苑英華》卷九四五，第4972頁；《全唐文》卷六七九，第6944頁。

④ (明)丘濬《張文獻公曲江集序》，丘濬《重編瓊台稿》卷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8冊，第169—170頁。

⑤ 《新唐書》卷一二六《張九齡傳》，第4424頁。

九齡傳》稱張九齡“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於始興，今爲曲江人”^①。而白居易則稱粵北始興張氏源於河北范陽，爲西晉司空張茂先即張華（232—300）之後，“永嘉南遷，始徙居於韶之曲江縣，後嗣因家焉”^②。然而，唐代始興張氏移居粵北山區，却並非始於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韶關市西北郊羅源洞張九齡墓葬中，發現了唐中書侍郎集賢學士徐安貞於開元二十九年（741）撰寫的《唐故尚書右丞相贈荊州大都督始興公陰堂志銘并序》，該碑稱張九齡“其先范陽人，四代祖因官居此地”^③。又據蕭昕《殿中監張公（九皋）神道碑》記載，始興張氏的先世在西晉末永嘉年間南渡，“遷于江表。皇朝以因官樂土，家於曲江”^④。意即始興張氏在“永嘉之亂”中先遷居江南。直至唐朝，因出仕韶州並喜愛這個地方，才開始定居在韶州曲江縣。《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亦稱，“始興張氏亦出自晉司空華之後，隨晉南遷，至君政，因官居於韶州曲江”^⑤。明代黃佐《廣東通志·姓氏》多是依據族譜寫成，其稱張氏，“姬姓，黃帝子青陽之後揮爲弓正，因命氏焉”，“始興張氏，出自晉司空華，隨晉南遷。隋塗山丞守禮子韶州別駕君政，因官於曲江，生六子”^⑥。

尤爲值得重視的是唐代徐浩所撰寫的《唐尚書右丞相中書令張九

① 《舊唐書》卷九九《張九齡傳》，第3097頁。

② （唐）白居易《唐故秘書監張仲方墓志銘》，四部叢刊本《白氏長慶集》卷六一；《文苑英華》卷九四五，第4972頁；《全唐文》卷六七九，第6944頁。

③ 《唐張九齡墓發掘簡報》，《文物》1961年第10期；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彙編》開元五二五號，第1517頁；《全唐文補遺》第一輯，第145頁。

④ 《文苑英華》卷八九九，第4731頁；《全唐文》卷三五五，第3598頁。

⑤ 《新唐書》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第2681頁。

⑥ （明）黃佐《廣東通志》卷二〇《民物志·姓氏》，廣州：廣東省地方志辦公室謄印，1997年，第522頁。

齡神道碑》，碑文詳細記載了始興張氏家族的來源，其文曰：

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其先范陽方城人。軒轅建國，弦弧受氏。(張)良，位爲帝師；(張)華，才稱王佐。或相韓五葉，或佐漢七貂。代有大賢，時稱盛族。四代祖守禮，隋鍾離郡塗山令；曾祖諱君政，皇朝韶州別駕，終於官舍，因爲土著姓。大父諱胄，越州剡縣令，列考諱宏愈，新州索盧縣丞。^①

按以上“因爲土著姓”，我們認爲是指自張九齡曾祖張君政之後，張氏家族就成爲韶州這一地方的“著姓”，即當地的名門望族。這裏的“土”，如同前引蕭昕所稱“因官樂土”的“土”一樣，應該是指嶺南韶州曲江縣這個地方。

近年來，研究唐代文學的知名學者戴偉華先生發表了《張九齡“爲土著姓”發微》一文，對張九齡生平事迹多有補闕發微之功。他將徐浩《張九齡神道碑》中的“因爲土著姓”，解讀成爲韶州當地的“土著”姓氏，認爲“是指世代代生於其地的人”。並以此作爲出發點，重新討論了張九齡的出仕經歷以及唐朝科舉考試中的譜牒世系等問題^②。不過，我們認爲這樣的解讀或許並不完全符合徐浩撰寫碑文的本意。對此，我們試作簡要討論。

首先，中古時代的“土著”一詞與現代意義的“土著”概念在含義上有很大的差別。今天的“土著”概念，往往是指世代代居住在當地的原始居民。然而，在漢晉至唐宋時期的“土著”一詞，一般是指定居

① (唐)徐浩《唐尚書右丞相中書令張公(九齡)神道碑》，《全唐文》卷四四〇，第4489頁。

② 戴偉華《張九齡“爲土著姓”發微》，《文學遺產》2011年第4期，第38—44頁。

的農耕生活方式，是相對於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來說的^①。作為現代意義的唐朝嶺南的“土著”，即居住於嶺南的原始居民，一般都是指嶺南俚獠等少數民族。衆所周知，《六祖壇經》記載六祖惠能即被五祖弘忍稱為“獠獠”。而張九齡因其出身於邊遠的嶺南，因此他對嶺南土著“獠人”這樣帶有蔑視性的稱呼其實也非常忌諱^②。而且唐朝的姓氏著作如《元和姓纂》、敦煌氏族志、《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等等，並未見將某個姓氏稱為“土著姓”的例子^③。

- ① 《漢書》卷六一《張騫傳》稱“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唐初顏師古注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第2689—2690頁）《漢書》卷九五《西南夷傳》稱“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自蒞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顏師古注曰：“土著，謂有常居著於土地也。”（第3837—3838頁）《漢書》卷九六《西域傳》稱：“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顏師古注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第3872頁）《新唐書》卷一〇〇《裴矩傳》稱，隋煬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環怪名寶，俗土著，易併吞。’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經略”（第3932頁）。《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記載黨項以“拓拔最强。土著，有棟宇，織犂尾，羊毛覆屋，歲一易，俗尚武”（第6214頁）；又稱吐火羅“與挹怛雜處，勝兵十萬。國土著，少女多男”（第6252頁）。唐代龐嚴《對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稱：“國家自幽、薊兵興，人無土著，士者、農者，遷徙不常，慕政化則來，苦苛暴則去。”（《全唐文》卷七二八，第7511頁）。所謂“人無土著”，是指唐“安史之亂”後，大量戶口放棄了原有的定居農耕生活，而是“遷徙不常”，儘量逃往唐朝官府控制相對薄弱的地區。
- ② （唐）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卷一〇《諷切》，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92頁。
- ③ 我們檢索《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古代文獻典籍，其中“土著姓”三个字相連接的表述僅有四例，然而均無今天土生土長的原住民含義的表達。這四例是：（1）《晉書》卷四八《段灼傳》稱：“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為西土著姓。”（2）《晉書》卷六八《顧榮傳》稱：“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3）《建康實錄》卷一九記載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世為閩土著姓，多變詐，梁朝晉安數為反叛，屢殺守將，陳寶應因官軍鄉導，討平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4）《太平廣記》卷九七“從諫”條引《出三水小牘》記載：“東都敬愛寺北禪院大德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為土著姓。”意其成為廣陵這一地方的著姓。

其次，從徐浩和張九齡之間的特殊關係來看，徐浩也不太可能將始興張氏稱為嶺南的“土著”。徐浩自己在該碑中結銜為“銀青光祿大夫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充嶺南節度支度營田五府經略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會稽開國公”^①。宋代《寶刻叢編》卷一九引《集古錄目·唐中書令張曲江碑》，稱“唐廣州都督嶺南節度使徐浩撰並書”^②。可見徐浩撰寫《張九齡神道碑》是在其任職廣州刺史之時。而徐浩出任廣州刺史，是在唐代宗大曆二年(767)至大曆三年^③。徐浩在碑文中記載其與張九齡的交往稱：“浩義深知己，眷以文章，禮接同人，惠兼甥舅。”可見，張九齡在政治上和文學上都有對徐浩的推獎提攜之恩。而且徐浩實際上還是張九齡的外甥。宋代著名書法家米芾《書史》記載：

唐彭王傅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告》。(徐)浩，九齡之甥。在其孫曲江仲容處，用一尺絹書，多渴筆，有鋒芒。^④

米芾所撰《寶章待訪錄》又稱：

唐彭王傅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右真迹，用一尺高絹書，多渴筆，詞云：“正大厦者，柱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沒猶稱其盛德。”今在其孫曲江人嶺南縣令張仲容處。某官于桂林借留半月，仍以紙覆裹，欲為重背。仲容惜其印縫古

① (唐)張九齡《曲江張文獻公集》，《叢書集成續編》第99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第257—261頁。而《全唐文》所收徐浩《張九齡神道碑》已刪去這一內容。

②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2冊，第479頁。

③ 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165頁。

④ (宋)米芾《書史》之“唐彭王傅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告》”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3冊，第32頁。

紙，不許。《九齡神道碑》亦浩書。^①

又根據《舊唐書·張九齡傳》記載，唐肅宗至德（756—758）初年，“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②。徐浩所書唐德宗《贈張九齡司徒告》，即指此。於此亦可見徐浩對張九齡一直深懷感恩之心。而在唐朝這樣還比較講究門第和郡望的時代，徐浩既然在碑文前面特地詳細地追溯了其家族的北方源流，也就不太可能再將始興張氏稱為嶺南的“土著”。

最後，至唐代宗大曆初年徐浩撰寫神道碑之時，張九齡已去世約二十八年，而此時始興張氏確實已成為韶州也是嶺南的大族。除了張九齡曾經位極人臣，以及張九齡之弟張九章和張九皋曾經擔任廣州刺史、嶺南節度史、殿中監、鴻臚卿等地方和中央的高官之外，始興張氏尚有不少家族成員出仕中央或地方。這種情況即使在北方中原地區也是相當少見的。因此，此時的始興張氏確實已屬於名副其實的“著姓”或名門望族。

總之，唐朝粵北始興張氏在西晉“永嘉之亂”中自范陽遷居江南。而其遷居粵北山區的韶州，則是唐朝初年的事情。始興張氏在定居嶺南後，雖然籍貫屬於韶州（始興郡），但長期仍然以北方范陽為郡望。對於唐人這種籍貫與郡望分離的現象，岑仲勉先生曾有專門的論述^③。

（二）唐初張氏家族因官留居粵北韶州的原因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具有北方家族背景的始興張氏家族在唐朝

① （宋）米芾《寶章待訪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3冊，第53頁。

② 《舊唐書》卷九九《第九齡傳》，第3100頁。

③ 岑仲勉《唐史餘瀋》卷四《唐史中望與貫》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29頁。

初年爲什麼會留居在韶州曲江呢？首先，自秦漢六朝以來，粵北韶州一直就是中原內地進入嶺南的交通要衝。唐朝皇甫湜《朝陽樓記》稱：“嶺南屬州以百數，韶州爲大。其地高，其氣清，南北之所同，貢朝之所途。”^①所謂“其地高，其氣清”，是說韶州因其接近內地而且地勢高朗，氣候比較宜人，使得這裏既沒有嶺南沿海一帶的颶風，也沒有嶺南腹地的濕熱和瘴癘^②。北宋“名臣”余靖（1000—1064）也是韶州曲江縣人，他在其《韶州新修望京樓記》中稱：“廣之旁郡一十五，韶最大。在楚爲邊邑，在越爲交衢……境壓騎田、大庾二嶺，古地最善。”^③其《韶州新修州衙記》又稱韶州：“控扼五嶺，韶爲交衢……唇齒江湘，咽喉交廣，地之重也；霜露北均，疫癘南盡，氣之和也；霞駁萬拱，雲蒸千礎，暑之廣也。合是數美，爲郡國最，不亦善乎！”^④在六朝至唐宋衆多文人筆下，粵北韶州既有雄奇壯麗的山水，又有比較適宜的氣候條件^⑤。而這一點在古代嶺南其實極爲重要。也正因爲如此，韶州既是北方移民

① 《全唐文》卷六八六，第7026頁。

② 《三國志》卷六一《吳書·陸凱傳》稱：“蒼梧、南海，歲有暴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隋書·地理志》記載：“自嶺已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癘，人尤夭折。”唐劉恂《嶺表錄異》稱：“嶺表山川，盤鬱結聚，不易疏泄，故多嵐霧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脹成蠱。”關於中古嶺南的氣候環境及其對疾病的影響，參見蕭璦《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原載《“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三本第一分，收入李健民主編《生命與醫療》，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第193—298頁；范家偉《六朝時期人口遷移與嶺南地區瘴氣病》，《漢學研究》第16卷第1期，1998年，第27—58頁。

③ （宋）余靖撰，黃志輝校箋《武溪集校箋》卷五，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7頁。

④ 《武溪集校箋》卷五，第183、184頁。

⑤ （唐）韓愈《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詩稱：“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全唐詩》卷三四四，第3860頁）宋代梁寺丞《韶石圖記》稱：“韶州佳山水之名聞於天下，而韶石爲之最。”（《輿地紀勝》卷九〇《廣南東路·韶州“風俗形勝”》引，第3122頁）

進入嶺南首先到達並定居的地區，同時也是嶺南開發最早的地區之一。南朝至隋，史籍中有不少韶州地方大族活動的記載，還有侯安都、張偲、麥鐵杖等人出任朝廷高官和地方刺史等官職^①。這些現象均與韶州的經濟社會發展有關。有資料表明，張氏遷居韶州曲江後，曾與當地大姓——譚氏家族聯姻^②。薛愛華甚至還把張九齡等稱為“克里奧爾人（creole）”^③，意即祖先是北方漢族而生於南越土著民族中的人。

其次，粵北韶州特定的地理環境使其文化的發展在嶺南地區有其先進性。韶州雖是多山地帶，但却是文化較為發達的地區。例如，韶州就是嶺南佛教發展最早的地區之一。根據南朝劉宋王韶之《始興記》記載，韶州在東晉時期即有嶺南最大的佛教寺院^④。而羅香林的研究也證明，六朝時代，韶州也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重地^⑤。從六朝至唐初，韶州已先後建立了衆多的佛教寺院。禪宗六祖惠能於唐貞觀十二年（638）出生於嶺南新州（今廣東省新興縣）。唐高宗儀鳳元年（676）在廣州法性寺薙髮，次年至韶州曲江縣曹溪大梵寺弘揚佛法，韶州因此成為嶺南佛教最興盛的地區，一直到先天二年（713）去世。惠能在韶州曲江共住了三十七年。惠能與張九齡堪稱唐代嶺南地域文

① 參見《陳書》卷八《侯安都傳》，第143—150頁；（宋）李昉《司空侯安都廟記》，屈大均《廣東文選》卷一七；（明）黃佐《廣東通志》卷五四《張偲傳》，第1388頁。《隋書》卷六四《麥鐵杖傳》，第1511—1512頁。

② （明）黃佐《廣東通志》卷五四《譚瑱傳》，第1392頁。

③ Edward H. Schafer,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21.

④ 《太平環宇記》卷一五九《韶州·曲江縣》引劉宋王韶之《始興記》曰：“靈鷲山，臺殿宏麗，面象巧妙，嶺南佛寺，此為最也。”（第2055頁）另見《水經注校證》卷三八《潯水注》，第901頁。

⑤ 羅香林《唐代廣州光孝寺與中印交通之關係》，香港：中國學社，1960年。

化兩位最傑出的代表，二人之間也有交往。五代至北宋初期，嶺南藤州（今廣西藤縣）籍的著名禪宗學者契嵩就記載：“昔唐相始興公張九齡方爲童，其家人攜拜大鑒，大鑒撫其頂曰：此奇童也，必爲國器。其先知遠見皆若此類。”^①粵北韶州這樣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往往能哺育出傑出的歷史人物。

當然，始興張氏在定居韶州曲江後，也是經過幾代人的積累才有張九齡這一輩的崛起。現存的一些較晚出的始興張氏家譜，往往都詳細地敘述其在隋朝以前顯赫的世系與官職^②。然而，這些記載與唐朝的歷史資料有較大差距，其可信度並不高。根據徐浩《張九齡神道碑》的記載，其四代祖張守禮，爲隋鍾離郡塗山縣令。曾祖張君政，因出任唐朝韶州別駕，張氏遂定居在韶州。祖父張胄，爲越州（今浙江紹興）剡縣令。父張弘愈，爲新州（今廣東新興縣）索盧縣（即六祖惠能的家鄉）的縣丞。《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與此基本相同^③。歐陽修等編修《宰相世系表》還依據了唐、宋時代的族譜。而且至宋代，唐代出世的《張九齡家傳》一書還在被人多次引用^④。

總之，從郡望和世系來看，始興張氏雖然發源於范陽，但是明顯只屬於范陽張氏的疏支。而且在西晉末年“永嘉之亂”遷居江南後，族史難徵，長期湮沒不顯。唐代徐浩的碑文以及歐陽修等編修的《宰相世

①（宋）契嵩《傳法正宗記》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1卷，第748頁。

② 例如張有源、張永堂等纂修《始興頓岡張氏族譜》，宣統三年（1911）修，始興文淵堂木刻本。參見羅香林《家譜叙錄》，《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3年。

③ 按《新唐書》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將“索盧丞”誤爲“索慮丞”，第2678頁。

④ 見（宋）胡仔《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一“杜少陵”條引，《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0冊，第103頁；（宋）佚名《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一八引，《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24冊，第241頁。

系表》，其記載始興張氏的家世，僅僅能上溯至隋朝曾任鍾離郡（今安徽鳳陽、蚌埠等地）塗山縣令的四代祖。從張九齡父祖的官爵來看，也僅屬於州佐縣令等中下級地方官員，且多仕宦邊遠的嶺南，因此，始興張氏確實只能屬於地位比較低微的家族。然而，張氏自從定居在嶺南之後，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確實已逐步成為冠冕蟬聯、簪纓不絕的儒學世家。正如唐文宗朝宰相韋處厚（773—828）所說：“張曲江自蓬戶發揮於嶺底，而繼播休名。”^①

唐代家族發展所表現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整個家族往往隨為官的家長輾轉遷徙，為官者試圖以此來實現對其大家族的庇護和統治。毛漢光先生認為唐代舊士族遷徙的主因，是由於選制亦即科舉制度所造成的巨大吸引力^②。而凍國棟先生則指出因官移貫也是舊士族遷徙的重要原因^③。嶺南作為一個逐漸被人認識和重視的區域，其有利於大宗族發展的經濟社會環境、北方官僚在任職地的政治社會地位，尤其是這些北方家族本身所擁有的文化優勢，使他們在定居嶺南後一方面形成“宗族盤亘”，充當地方著姓，另一方面則憑藉宗族累積的實力在仕宦與文化上不斷脫穎而出。這也是不少北方官僚士大夫及其家族“樂在南國，不欲北轅”^④的真正原因。

（三）始興張氏家族在唐朝崛起的原因

始興張氏家族在唐朝前期的崛起仍是有迹可尋的。如前所述，張

①（唐）韋處厚《上宰相薦皇甫湜書》，《全唐文》卷七一五，第7350—7351頁。

② 毛漢光《從士族籍貫遷徙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第333頁。

③ 凍國棟《唐代人口問題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62—264頁。

④（唐）徐浩《唐尚書右丞相中書令張公（九齡）神道碑》，《全唐文》卷四四〇，第4491頁。

九齡作為嶺南籍士人通過科舉進士考試走上仕途，並因此進入唐中央王朝權力的核心，本身是“中古社會革命”的反映。因為這種情況在唐朝以前的時代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們首先有必要瞭解唐朝以前中央王朝選官制度對嶺南士人的影響，以及中原內地人士對於嶺南的認識。西晉張華是張九齡的遠祖，其所著《博物志》就稱：“南越之國，與楚為鄰。五嶺已前至於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土，謂之南裔。”^①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稱：“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②因此，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五嶺不但是一個重要的地理分界線，同時也是一條華夏與蠻夷在文化上的分界線。一直到唐朝，著名宰相狄仁傑在給武則天的上書中尚稱：“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③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宋之問被貶嶺南瀧州(今廣東羅定縣)參軍，途經作為五嶺通道的大庾嶺，其《蚤發大庾嶺》一詩稱，“嶸起華夷界，信為造化力”，“登嶺恨辭國，自惟勛忠孝”，“適蠻悲疾首，懷輦淚霑臆”^④。唐朝杜佑《通典》云：“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為雄……大抵南方遐阻，人強吏懦，豪富兼併，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⑤因此，嶺南長期被視為“蠻荒”和“絕域”。秦漢時期，嶺南籍士人參與中央王朝政治事務的記載完全是空白。在魏晉南北朝的門閥統治時期，由於九品中正制的選官方式高度重視門第和郡望，也基本上排除了嶺南籍士人通過正常

① (西晉)張華撰，范寧校證《博物志》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9頁。

② 《水經注校證》卷三六，第834頁。

③ 《舊唐書》卷八九《狄仁傑傳》，第2889頁。

④ 《文苑英華》卷二九〇，第1478頁；《全唐詩》卷五一，第623頁。

⑤ 《通典》卷一八四《州郡十四·古南越》，第4916頁。